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中的吏治理想

□ 王华宝

历史文化 典籍

《史记》七十列传中，《循吏列传》是中国史学史上首部集中记述良吏群体的专传，承载着司马迁对理想吏治的深度思考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有言“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”，寥寥数语勾勒出循吏理政的最高境界。《循吏列传》并非孤立的人物传记，而是一套兼具制度根基与思想深度的治理范式，是中国传统吏治理想的经典表达。

何谓“循吏”

“循吏”之名，首见于《史记》，其核心在一“循”字。就字义而言，“循”兼具双重内涵：一为奉法循理，即恪守法度、遵循义理，是对官吏职业操守的底线要求；二为因顺循化，即顺应民情、遵循规律，是对治理能力的更高层次的要求。二者合一，构成了循吏的基本定义：既坚守法理原则，又善用教化引导，在法度框架内实现无为而治。

《循吏列传》共载孙叔敖、子产、公仪休、石奢、李离五位春秋战国名臣，时间跨度从晋文公时期到春秋末年，地域覆盖楚、郑、鲁等诸侯国。司马迁择取这五人入传，并非简单罗列政绩，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典型，构建出完整的理想官吏画像。《史记》的循吏群像带有鲜明的“应然”属性，它回答的是官吏应当如何为政这一根本问题。所载的五位人物各有侧重，孙叔敖善因俗而治，子产长教化理政，公仪休守清廉边界，石奢、李离重奉法殉道，成为后世两千余年评判良吏的原型参照。

何以为范

司马迁笔下的循吏理想并非凭空产生，而是植根于先秦至秦汉吏治制度的长期演进，睡虎地秦简《为吏之道》的出土，清晰展现了这一理想的源头。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的《为吏之道》，是秦代基层官吏的为官手册，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系统吏治规范文本。该简文共51枚竹简，核心内容为“五善”与“五失”。“五善”即“忠信敬上、清廉毋谤、举事审当、喜为善行、恭敬多让”，涵盖政治忠诚、职业操守、行政能力、道德修养与人际伦理五个维度；“五失”划定了官吏的核心行为禁区，连同全篇其他行为禁忌，涵盖了对民傲慢、贪财好利、擅权妄为、渎职失察等十余类过失，几乎覆盖了基层官吏违法失职的主要类型。《为吏之道》并非纯任刑法的法家规范，其制度框架源于法家的吏治思想，而伦理要求则大量吸收了儒家的忠信、清廉、礼让等理念。这种“外法内儒”的吏治规范，植根于秦代“以吏为师”的制度环境。

如果说《为吏之道》是官方层面的底线，是所有官吏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，那么《循吏列传》则是史家层面的理想。《为吏之道》的“五善”是循吏的基础要求，而循吏的境界则是对“五善”的超越与升华——从被动的制度约束，转向主动的道德自觉；从机械地执行法令，转向灵活的治理实践。司马迁作《循吏列传》，有着深刻的现实关照。汉初推行黄老“无为而治”，吏治宽缓、民生安乐，形成了“吏治烝烝”的局面；而随着国力强盛，多欲政治抬头，吏治生态也随之发生变化。司马迁追忆先秦循吏，本质是对汉初无为而治的回望与肯定，也是对理想治理模式的呼唤。从思想渊源来看，循吏“因循为治”的核心理念，正源于黄老道家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”的治道思想，是黄老政治在官吏群体身上的人格化体现。

何以践行

《循吏列传》的价值，不仅在于树立了理想人格，更在于提供了一套可践行的治理方法。

因势利导、顺民而治。孙叔敖治楚，最能体现这一特点。楚庄王嫌马车矮小，下令加高门槛。孙叔敖并未强行推行政令，而是建议加高里巷的门槛。百姓为了通行方便，自然会加高马车，既达成了政策目标，又避免了扰民。他鼓励百姓进山采伐，利用河流运输，也是顺应当地的资源禀赋与生产习惯，实现了“不教而民从其化”的治理效果。子产治郑，从“国乱，上下不亲”到“门不夜关，道不拾遗”，靠的不是严刑峻法，而是循序渐进的教化与引导，顺应郑国的国情民情逐步施策。这种“顺民而治”的思路，是循吏区别于苛吏的核心特征：治理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改造，而是因势利导的自然化成。

奉法循理、守正不阿。石奢为楚昭王相，巡行途中遇杀人者，追及方知是自己的父亲。他放走父亲后自系请罪，认为“以父立政，不孝也；废法纵罪，非忠也”，最终伏剑自刎。李离为晋文公狱官，因误听案情错杀无辜。他拒绝晋文公的宽赦，认为“理有法，失刑则刑，失死则死”，最终伏剑而死。在二人身上，法不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，而是具有超越性的道义准则。他们所捍卫的，不是某一位君主的权威，而是法律本身的尊严。这种“法高于君”的精神，是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，也将“奉法循理”的内涵推向了极致。

清廉自守、不与民争利。公仪休为鲁相，是清廉为官、不与民争利的典范。他嗜鱼却不受宾客所赠之鱼，认为“受鱼而免于相，则不能自给鱼，无受而不免于相”，道出了为官者清廉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。此外，公仪休看到自家菜园的葵菜长得好，就拔了扔掉；看到妻子织布技艺高超，就休掉妻子烧掉织机，理由是“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”——做官的人不能与百姓争夺生计，不能利用职权挤占民生的空间。

修身垂范、化行于民。治理的最高境界，是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影响民众，实现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的教化效果。《循吏列传》中的五位循吏无一不是修身的典范：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，三去相而不悔；子产为政宽猛相济，深得百姓爱戴；公仪休清正廉洁；石奢、李离以身殉法，彰显了制度的尊严。他们不以政令强迫百姓，而以自身的言行作为表率，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，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自然和谐。

《循吏列传》虽篇幅不长，却是中国史学史上首部集中记述良吏群体的专传，开创了正史为循吏立传的书写传统。自此以后，从《汉书》到《明史》的二十四史中，绝大多数设有《循吏传》（或称《良吏传》《能吏传》）；《清史稿》亦承袭此体例，形成了延续两千余年的正史吏治书写传统。此外，循吏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符号。一方面，它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吏治建设的理想范本，引导官员修身奉法、勤政爱民，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道德标尺；另一方面，它也塑造了民间社会对“好官”的集体想象，成为民众评价地方治理的重要参照。司马迁曾言，“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”。真正的善治，从来不是靠严刑峻法堆砌而成。《循吏列传》所承载的，不仅是对古代良吏的追慕，更是对理想吏治的追求。

（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）

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

——明代理学名臣丘濬的经世情怀

□ 杨 显

人物志

丘濬（1421—1495年），亦称丘浚，字仲深，谥号“文庄”，广东琼山（今海南海口）人，历仕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四朝，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，是明代海南唯一入阁参预机务的大臣，后世誉其为“布衣卿相”。经世致用是丘濬治学与从政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，也是其一生学术与事功的根本底色。所谓经世情怀，是儒者将个人学识与国家治理、社会治乱、民生休戚紧密联结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品格。丘濬起自边陲布衣，终登庙堂之高，平生经世抱负与治世思虑，尽倾注于《大学衍义补》160卷之中（另有补前书1卷、目录3卷，总计164卷），书中涵盖朝政、吏治、民生、理财、兵刑等内容，展现其超越时代的治理洞察力。

丘濬经世情怀的生成，植根于家族庭训的濡染与仕宦生涯的磨砺，是儒家理想与人生体悟相融合的结果。丘濬7岁丧父，由祖父丘普与母亲李氏抚育成人。丘普时任临高县医学训科，手书“可继堂”匾额，对两孙分寄期许：长孙丘源“承吾世业，学为良医，以济家乡”，次孙丘濬“拓吾祖业，达而为良相，以济天下”。这份“良相济天下”的家族嘱托，在丘濬心中埋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。母亲李氏守节抚孤，持家严正，即便丘濬后来入仕京师，母亲仍“每谆谆以忠谨报国为言”，将忠谨报国的品格刻入其立身准则。家庭氛围的长期浸润，使丘濬自幼便将个人进退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，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方向。

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，丘濬以二甲第一名登进士第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由此步入仕途。此后20余年间，他历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讲、学士，官至国子监祭酒，正如其进书表中所言：“六转官阶，皆司文墨，莫试莅政临民之技”。长期的馆阁生涯，使其未能亲掌地方民政、实地施展治术，却也让他得以遍览皇家典籍，熟知历代典章制度与朝政得失。这种“平生所学，竟不得一施为”的沉潜境遇，非但未消磨其济世之志，反而坚定了他以著述经世的路径选择——既不能身任其事，便以笔为器，将平生治世方略托诸典籍，供君臣施政采择。数十年的思想沉淀，最终催生了《大学衍义补》这部著作。

《大学衍义补》的撰述，不仅是丘濬经世思想的重要体现，还是对儒家《大学》治道体系的自觉补全。南宋真德秀所撰《大学衍义》，重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、齐家四项“内圣”功夫，于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外王事业付之阙如。丘濬有感于此，决意补其未备，以“治国平天下之要”为核心，博采六经诸史百家之言，参照明代典制与现实弊政，设立正朝廷、正百官、固邦本、制国用、明礼乐、秩祭祀、崇教化、备规制、慎刑宪、严武备、驭夷狄、成功化十二纲目，下辖一百一十九子目，系统填补了《大学》“八条目”在制度施政层面的空白。该书始撰于成化十五年（1479年），至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年）成书，耗时近10年。其编纂遵循“酌古道而施于今政”的原则，每事皆先引经传史事，再附以“臣按”抒发己见，旨在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提炼可资当世的治国方略。

丘濬的经济思想尤具前瞻性。他明确提出，劳动产品的价值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决定，价值高低与劳动耗费量成正比。这一朴素的劳动价值论观点，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·配第的相关论述早了170余年。在商业政策上，他主张“民自为市”，反对官府过度管控工商业，认为市场具备自我调节能力，官府垄断定价只会阻碍民间交易的自由开展。在货币制度上，他提出“三币之法”的改革方案：以白银为上币，作为价值基准；纸钞为中币，铜钱为下币，二者作为日常流通工具；官府以白银储备为基础调节钱钞比价，维持货币体系稳定。这些主张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。

丘濬出身寒微，深知民间疾苦，其民本思想的核心是“藏富于民”。他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中提出“民之富，即君之富也”“古者藏富于民，民财既理，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”，将富民与富国相统一，认为民生富足是国家强盛的根本。针对明代中期土地兼并加剧、赋役不均的弊政，他针对性地设计了配丁田法：以既定年限为界，此前民户田产虽多不咎，此后每丁仅许占田一顷；同时以丁配田、按田定役，田多丁少者出银雇役，田少丁多者出力当差，试图在平稳过渡的前提下均平赋役负担，同时抑制土地兼并的加剧。此外，他主张放宽民间工商业与海外贸易限制，通过加强商品流通实现民富国强。

丘濬不是“以章句相高，以清谈为尚”的书蠹，其经世思想亦非空疏的理论推演，而是始终贯穿着“道不虚谈，学贵实效”的品格，实现了从“体”到“用”的方法论转向。他自幼“有志用世，于凡天下户口、边塞、兵马、盐铁之事，无不究诸心意”，重视对具体政务的钻研。如果说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的特点是“以理统事”，侧重道德原则的阐发，那么丘濬《大学衍义补》的特质便是“以事见理”，将抽象的治道原则拆解为可操作的条目。这种“理在事中”的思路，消解了传统儒学中“理”与“事”、“体”与“用”的二元对立，将经世之志从泛泛的道德说教转化为依托专门知识的实践，是中国古代经世思想的重要发展。

这样的务实品格同样体现于丘濬的仕宦生涯之中。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，面对当时文坛尚险怪、重辞藻的浮靡文风，他力倡“文以载道”“经世致用”，在科举考校与日常教学中痛抑空疏浮华之文，引导士子关注实务、砥砺实学，极大扭转了国子监的学术风气，对明代中期学风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针对明代理学渐趋空疏、士大夫多以谈心性博取名声的风气，丘濬明确指出，空谈心性仅可博取道德虚名，而广博的治国识略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。

丘濬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经世致用。他以布衣之身登宰辅之位，与明代清官海瑞并称“海南双璧”，成为后世岭南士子的精神楷模。史学大家钱穆评价丘濬“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，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”，正是对其历史地位的精准概括。

在文化荒原上点燃阅读火种

——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的百年变迁与文脉守望

□ 张 丽

公共图书馆是滋养民族心灵、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，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。当文明的火种尚未播撒至澳大利亚大陆最西端时，广袤的西澳大利亚州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属一片荒原——开发滞后、根基薄弱，知识与阅读远未成为全民可及的公共资源。1889年，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的前身维多利亚公共图书馆，在珀斯一栋临时租用的银行楼宇中诞生。从空间局促、藏书千余册的简陋阅览室起步，这座图书馆恰似被点燃的阅读火种，历经百余年，终成燎原之势。



殖民拓荒时期的火种初燃

19世纪中后期的澳大利亚西部，尚处于殖民拓荒阶段，经济依赖农牧业与矿业支撑，现代公共文化体系近乎空白。当澳大利亚东部各州已建起成体系的公共图书馆与学术机构，阅读已成为城市生活的寻常景致时，澳大利亚西部的知识资源仍被教会与少数精英阶层垄断，民间仅有零散的私人藏书，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免费、稳定、开放的阅读渠道。殖民拓荒的一手档案、原住民绵延千年的文化印记、早期移民的集体记忆，都在缺乏系统保存的环境下面临永久散佚的风险。这片土地迫切需要一座公共图书馆，来填补文化教育的空白。

1886年，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，西澳大利亚州殖民政府专项拨款筹建公共图书馆，播下了第一粒文化种子。1889年1月26日，维多利亚公共图书馆在临时馆舍正式开放，初始藏书仅1786册，却以“面向全民的参考阅览机构”为定位，向所有民众敞开阅览大门，在珀斯开辟出首个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。初创时期的馆舍逼仄简陋，经费时断时续，制度亦未健全，但这座“银行里的图书馆”已然打破了知识垄断的坚冰，让阅读与求知的微光第一次照进普通民众的生活。此后，在首任首席馆长詹姆斯·赛克斯·巴蒂的主持下，这点微弱的火种迅速步入规范发展的轨道。1904年，场馆更名为西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，完成了从纪念性场馆向地方公共文化机构的身份转变。随着1913年哈克特礼堂的落成，图书馆终于拥有了长期稳定的馆舍，也成为珀斯当之无愧的城市文化地标。

全域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

20世纪初，伴随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与地方治理体系的完善，这一时期的图书馆逐步从临时性文教场所迈向法定州立文化机构，阅读的火种也从珀斯一隅向全州广袤土地拓展。1951年，《西澳大利亚图书馆委员会法案》颁布实施，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法定地位，建立起常态化财政保障、馆藏建设、公共服务与现代化治理架构，成立图书馆董事会统筹运营。这一法案彻底破解了早期经费不稳、定位不清、职能不明、发展无序的困境，让图书馆事业真正步入法治化、规范化、长效化的发展轨道。1956年，图书馆正式定名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，与州博物馆、州美术馆并列，成为全州三大公共文化支柱机构。

首任州立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·奥比·沙尔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基层延伸，牵头搭建全州公共图书馆网络：1954年，首个地方分馆在约克镇开放，至1976年全州已建成约150家地方图书馆，同步建立起馆际互借与参考咨询体系，实现了文献资源的跨区域流通。与此同时，他推动本土图书馆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，有效提升了全行业的专业化水平。此后，进一步深化服务全覆盖与区域化布局，1982年实现全州139个地方政府均设有公共图书馆，设立11个区域服务中心辐射偏远基层；1983年上线自动化管理系统；1985年迁入亚历山大图书馆大楼，完成了空间扩容、技术迭代、管理升级的三重跨越。这使得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从零散的单点服务，升级为统一规范、覆盖全州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。

集体记忆的留存与守望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历任管理者与馆员持续开展系统性的征集、抢救、整理与保护工作，收藏殖民拓荒档案、淘金热史料、海事记录、政府文献、原住民文化遗产、移民族群史料、地方文学艺术作品等珍贵文献。这些馆藏完整记录了从蛮荒边陲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，填补了澳大利亚西部区域史研究的空白，更让濒临散佚的地域集体记忆得到了系统性、永久性留存，在时代奔涌中守住一方土地的来路与根脉。

此外，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也使得历史底蕴与现代功能共生共荣。哈克特礼堂等历史建筑保留着百年前的文化底蕴，持续面向公众开放服务，成为城市活态的历史见证与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；新馆空间则不断拓展现代化服务场景、完善全民服务设施，满足当代公众的多元文化需求。与此同时，档案职能逐步走向专业化：1945年图书馆设立档案分部，系统开展地方档案征集与保存。1999年设立独立查阅室，并定名为“州档案办公室”。随着2000年《西澳大利亚州档案法》正式实施，进一步厘清了典藏、档案、公共服务的职能边界，让历史保护与公共服务协同发力、各尽其责。

普惠服务的薪火相传

进入信息时代，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主动顺应时代转型迭代，完成了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、多元文化包容平台、数字文脉传承阵地的功能升级，让阅读的火种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光亮。1995年，上线新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、官方网站与在线馆藏目录；1996年实现全馆互联网接入，同步启动珍贵文献数字化保护与线上开放工程。数字化建设打破了馆舍在物理空间与地域边界的限制，让全球的研究者与普通民众都能便捷获取西澳大利亚州的历史资源，实现了文脉传承的创新性发展与跨时空传播。在服务维度上，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将全民阅读推广、公共文化活动、地方历史科普、族群文化传承纳入核心职能，尤其关注原住民文化保护与多元移民族群的文化需求，以平等包容的理念提供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，践行全民普惠、文化共生的理念。

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从银行楼宇里的千册藏书起步，在文化荒原上点燃阅读火种，让星火终成炬火。它不仅是一座文献宝库，更是地域文明的见证者、守护者与传续者，在岁月长河中持续照亮着民众的精神世界。

（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中心主任）

图书馆史话